

日本经济“双循环”关系的理论 内涵、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

田正 李鑫^{**}

内容摘要：在战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之间的关系则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明晰双循环经济体系所具有的三重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存量一致性模型，指出：双循环体系下家庭消费、企业产出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应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本文还以实证方法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双循环体系，认为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日本经济的双循环体系运行表现出明显差异。产业空心化、产业政策失效、收入差距扩大是这一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流通业改革能提高日本国内循环效率。日本只有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体系才有助于其经济增长。

关键词：日本 存量一致性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 产业空心化 流通业

日本是后发展国家，其经济的内外循环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复苏、高速增长、稳定增长、长期低迷等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又表现出不同的绩效，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战后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历史、理论与政策研究”（编号：21BGJ057）的阶段性成果。

** 田正，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李鑫，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主任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

增长率从高速增长时期的8%~9%下降至长期低迷时期的0%~1%,^①经济绩效表现出巨大差异,需要进一步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问题。中国学界对日本经济的“双循环”问题已经展开了分析。比如,金仁淑等通过分析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认为摆脱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是经济大国真正实现崛起的关键因素。^②李自磊认为,内循环是日本主要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在欧美的压力之下实施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其经济内部资金脱实向虚,并引发去工业化、资产价格泡沫等一系列问题。^③国内学界对于日本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发展历史与经验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积累,普遍认为内循环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采用宏观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探讨日本经济双循环的研究仍不多见。为此,本文使用存量一致性(stock flow consistent)模型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双循环体系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并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验证日本经济双循环的实际运行情况,探讨其经验与教训。

一 “双循环”的三重内涵

二战后,得益于在消费和投资等内循环领域的快速增长,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的内需下降,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升高,这激化了日美贸易摩擦。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采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扩大需求政策,引发了泡沫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其国内与国际循环具有以下特点。

-
- ① 更详细内容可参阅田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36页。
② 金仁淑、王森焱:《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际经验及中国路径》,《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③ 李自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其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增强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为此，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其中，生产是国内大循环的起点，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流通与分配则是连接二者的重要桥梁。一方面，要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换言之，需要在供给层面下大力气，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构建符合新形势需要的产业体系。为此，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钱纳里基于对 101 个国家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了“标准结构理论”，认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三次产业体系结构比例关系遵循以下规律：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由迅速上升转变为增长逐渐放缓，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国家在产业结构变革中处于有利地位，通过发挥国内市场巨大的规模效应，即可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实现产业结构变革。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具有高生产率的新兴产业部门聚集，从而提高供给侧质量。^①另一方面，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内需增长中更是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为此，在需求层面，要不断释放内需潜能，大力培育新型消费，持续促进传统消费，积极发展服务消费，不断扩大绿色消费，完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和罗宾逊等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问题愈加凸显，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企业利润所占比例则会越来越高，从而阻碍消费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实施合理的分配政策，确保工资收入与企业利润维持平衡关系。^②有效平衡不断增加的企业利润与持续减少的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有效增长，

① 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第 22 页。

② 韩建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研究综述》，《经济纵横》2011 年第 1 期。

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进而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

其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以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即在建立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扩大进口,吸引外资,加大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力度,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大循环,进而提高国内供给质量。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 市场规模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决定了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一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就能吸收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② 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当地生产会产生积极的学习效应,有利于提高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并在业务运营过程中为其他公司提供学习溢出。^③ 此外,进口也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与跨国公司子公司同处一个行业的东道国公司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能够慢慢了解其进口产品的主要特征,从而有可能以更低成本形成类似技术。^④ 另一方面,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即以国际循环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通过提高内部创新力与资源使用效率,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水平。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出口具有学习效应,开展对外贸易可以提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面对广阔的全球市场,不仅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在与国际生产者、国际消费者的接触中不断学习行业内

①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构建新发展格局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第26页。

② Green, R. T., Cunningham, W. H., "The Determinants of US Foreign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15, No. 2/3, 1975, pp. 113-120.

③ [美] 布朗温·H. 霍尔、内森·罗森伯格主编《创新经济学手册》第2卷,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81页。

④ [美] 布朗温·H. 霍尔、内森·罗森伯格主编《创新经济学手册》第2卷,第93页。

的国际前沿技术，从而推动企业主动学习创新，提高生产率，也能获得更高的竞争能力。洛克使用配对取样技术研究了1994~2000年斯洛文尼亚制造业公司的微观数据，认为参与出口市场能够提高公司的生产率，且参与出口的公司和不参与出口的公司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会逐渐扩大。^①

其三，双循环体系并非单纯的“内循环”或“外循环”。一方面，双循环体系不是单纯的“内循环”。凯恩斯的理论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递减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能通过国内市场的自主调节而完全解决，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弥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贸易顺差在乘数效应的影响下会提高本国收入，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②另一方面，双循环体系也不是单纯的“外循环”。双循环体系并不能仅仅依赖国际市场来寻求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虽然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资本利润率、缓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持续下滑难题，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循环存在的深刻问题，而且会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爆发。^③歌川学等的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推动日本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同时在国内开展结构改革，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企业经营利润增加，但也引发了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机能减弱、出口企业竞争力衰退等问题，进而导致日本经济在生产与需求两个层面都陷入衰退趋势。^④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复苏、高速增长、稳定增长、长期低迷等历史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施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扩大对外出口，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并在

① De Loecker, J., “Do Exports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love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73, No. 1, 2007, pp. 9-98.

② 朱星舟：《论双循环经济格局中的国际贸易》，《中国市场》2021年第15期。

③ 宋宇、孙雪：《经济循环理论的比较与启示》，《经济纵横》2021年第8期。

④ 歌川学·伊藤拓也·田辺麟太郎·村上研一·森原康仁『資本主義を改革する経済政策』、かもがわ出版、2021、54頁。

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随着1986年日美签署半导体协议,日本政府开始反思以外循环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通过大力开发国内市场来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本文将在阐明双循环理论所具有的“三重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存量一致性模型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理论分析,并基于日本的实践开展模拟分析,揭示不同循环体系下经济绩效的显著差异。

二 存量一致性模型分析

为从宏观经济理论上分析双循环体系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主要变量的影响,本文参考多斯桑托斯与泽扎^①、戈德利与拉沃伊^②、尼基弗洛斯与泽扎^③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存量一致性模型。和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比,存量一致性模型能够有效衔接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运行,从而更好地分析双循环体系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消费、投资、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变量的深层次影响。

(一) 双循环体系下存量一致性模型的构建

本文构建的存量一致性模型涉及5个部门。一是家庭部门,家庭通过工资、失业金和资产收入来维持消费,同时持有3种金融资产,即政府债券、国内货币和企业股票。二是企业部门,企业雇用家庭劳动力生产商品,并向家庭劳动力支付工资。参考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企业权益资本相对稳定的特征,本文假定企业部门的权益资本

① Dos Santos, C. H., Zezza, G., "A Simplified, Benchmark, Stock-flow Consistent Post-keynesian Growth Model", *Metroeconomica*, Vol. 59, No. 3, 2008, pp. 441-478.

② Godley, W., Lavoie, M., *Monetary Economic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edit, Money, Income, Production and Wealt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③ Nikiforos, M., Zezza, G., "Stock-flow Consistent Macroeconomic Models: A Surve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891, 2017.

比不变,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募集新的生产性资本。企业还将部分利润留存以扩大投资或持有货币。三是政府部门,政府支出包括经常性支出和失业金支付,并通过税收和发行债券来获取融资。四是中央银行部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为实体经济交易活动提供结算便利,并持有外汇储备和部分政府债券。五是国外部门,国外部门为国内企业部门提供前沿生产技术,为国内市场提供进口品,也是国内商品的出口市场。5个部门的交易流量矩阵表如表1所示。

表1 5个部门的交易流量矩阵表

项目	国内				国外
	家庭	企业		政府	
		经常账户	资本账户		
消费	$-C$	$+C$			
投资		$+I$	$-I$		
政府支出		$+G$		$-G$	
出口		$+X$			$-X$
进口		$-M$			$+M$
工资	$+WB$	$-WB$			
税收	$-T^h$	$-T^f$	$+T$		
失业金	$+U$	$-U$			
利息支付	$+r_{t-1}B_{t-1}^h$			$-r_{t-1}B_{t-1}^g$	$+r_{t-1}B_{t-1}^{cb}$
企业利润	$+F^h$	$-F$	$+F^f$		
央行利润				$+r_{t-1}B_{t-1}^{cb}$	$-r_{t-1}B_{t-1}^{cb}$
政府债券变动	$-\Delta B^h$			$+\Delta B^g$	$-\Delta B^{cb}$
企业股票变动	$-\Delta e^d \cdot P^e$	$+\Delta e^s \cdot P^e$			
国内货币变动	$-\Delta H^h$		$-\Delta H^f$		$+\Delta H^{cb}$
外汇储备变动				$-\Delta F_x \cdot XR$	$+\Delta F_x \cdot XR$
列求和	0	0	0	0	0

从表1可以看出,家庭、企业、政府、央行和国外部门的净交易流量均为0,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到5个部门的存量资产负债表(见表2)

表2 5个部门的存量资产负债表

项目	国内			央行	国外	行求和
	家庭	企业	政府			
政府债券	$+ B^h$		$- B^g$	$+ B^{cb}$		0
企业股票	$+ e^s \cdot P^e$	$- e \cdot P^e$				0
国内货币	$+ H^h$	$+ H^f$		$- H^{cb}$		0
外汇储备				$+ F_x \cdot XR$	$- F_x \cdot XR$	0
固定资产		$+ K$				$+ K$
净值	V^h	V^f	V^g	V^{cb}		

从表2可以看出,在双循环体系中,家庭部门积累政府债券、企业股票和国内货币3种资产;企业部门持有国内货币和固定资产两种资产,同时向家庭部门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政府向家庭、企业和中央银行发行债券;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和政府债券两种资产,同时向家庭和企业发行国内货币。进一步描述5个部门的方程如下:

$$YD_t = WB_t + U_t + r_{t-1} B_{t-1}^h + F^h - T^h \quad (1)$$

$$c_t = \alpha_1 \cdot YD_t + \alpha_2 \cdot V^h \quad (2)$$

$$i_t = \gamma \cdot (K^T - k_{t-1}) + da \cdot k_{t-1} \quad (3)$$

$$P_t = (1 + \theta) \cdot UC_t \quad (4)$$

$$UC_t = (W_t + M_t) / s_t \quad (5)$$

$$s_t = c_t + i_t + g_t + x_t \quad (6)$$

$$UR_t = 1 - (WB_t / W_t) / (act \cdot N) \quad (7)$$

$$\ln(W_t) = \beta_0 + \beta_1 \cdot \ln(A_t) + \beta_2 \cdot \ln(ER_t) \quad (8)$$

$$\Delta B^g = G_t + U_t + r_{t-1} B_{t-1}^g - T_t - r_{t-1} B_{t-1}^{cb} \quad (9)$$

其中,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 YD_t 由工资、失业金、政府债券利息和企业利润加总后扣除缴纳的税金后得到。家庭消费 c_t 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财富水平。企业投资 i_t 由意愿投资水平和实际投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以及折旧

共同决定。商品价格 P_t 由生产成本加成决定, 生产成本 UC_t 则取决于工资以及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总供给水平 s_t 。总供给水平 s_t 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共同决定。失业率 UR_t 等于 1 减去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工资水平 W_t 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就业率。政府财政赤字 ΔB^g 等于一般性支出、失业金、证券债券利息支出之和减去总税收以及中央银行上缴持有的政府债券利息收入。

(二) 模型参数校准

本文参考拉沃伊与戴格尔^①、马齐耶与艾列迪^②、格林伍德-尼莫^③的方法, 结合日本 1960~2021 年度的数据进行校准。1990 年前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以 1990 年为界分为两段, 可以校准得到两组参数 (见表 3)。

表 3 相关模型参数校准值

	参数	1960~1990 年度	1990~2021 年度
家庭部门	α_1	0.92	0.87
	α_2	0.18	0.21
企业部门	γ	0.15	0.13
	da	0.18	0.15
其他项目	\emptyset	0.186	0.173
	act	0.784	0.563
	β_1	1	0.8
	β_2	0.1	0.3

注: α_1 表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α_2 表示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消费倾向; γ 表示企业意愿投资弹性, da 表示投资对固定资本存量弹性; \emptyset 表示价格加成弹性; act 表示有效劳动参与弹性; β_1 表示工资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反应弹性, β_2 表示工资增长对实际就业率的反应弹性。

① Lavoie, M., Daigle, G., “A Behavioural Finance Model of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s within a Stock-flow Consistent Framework”, *Metroeconomica*, Vol. 62, No. 3, 2011, pp. 434-458.

② Mazier, J., Tiou-Tagba Aliti, G., “World Imbalances and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s: A Three-country Stock-flow Consistent Model with Fixed or Flexible Prices”, *Metroeconomica*, Vol. 63, No. 2, 2012, pp. 358-388.

③ Greenwood-Nimmo, M., “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in a Two-country Stock-flow-consistent Mode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8, No. 4, 2013, pp. 839-867.

由此可以看出,以1990年为界,日本的经济双循环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家庭部门的变化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92下降至0.87,同时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18上升至0.21;受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的综合影响,家庭部门的边际储蓄倾向增强。从企业部门的变化看,企业意愿投资弹性由0.15下降至0.13,同时投资对固定资本存量的弹性由0.18下降至0.15,带动了企业整体的投资弹性下降。价格加成弹性由0.186降至0.173,显示整体经济价格长期通缩化倾向加剧。同时,老龄化带动有效劳动参与弹性由0.784降至0.563。工资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反应弹性由1降至0.8,对实际就业率的反应弹性由0.1增长至0.3,反映出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背离程度加大,同时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愈加激烈。总之,相关参数的特征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后的宏观经济运行较为契合,反映出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家庭部门储蓄增加,企业投资减少,并表现出长期通缩、老龄化加剧、工资增长停滞等特征。

(三) 双循环体系下主要经济指标运行的模拟分析

在构建存量一致性模型以及开展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本文就双循环体系、单一外循环体系、单一内循环体系三种具体情况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如下。

其一,双循环体系下,家庭消费水平和企业产出水平相对更高。从图1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双循环体系下的家庭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单一内循环和单一外循环模式主导下的家庭消费水平,同时双循环体系下的企业产出水平也高于单一内循环和单一外循环模式主导下的企业产出水平。其机制主要在于,在双循环体系下,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水平随之提高,进而也会带动家庭消费水平相对提高。

其二,双循环体系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更高,但净出口水平略低于单一外循环模式。从图2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双循环体系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单一内循环和单一外循环模式主导下的全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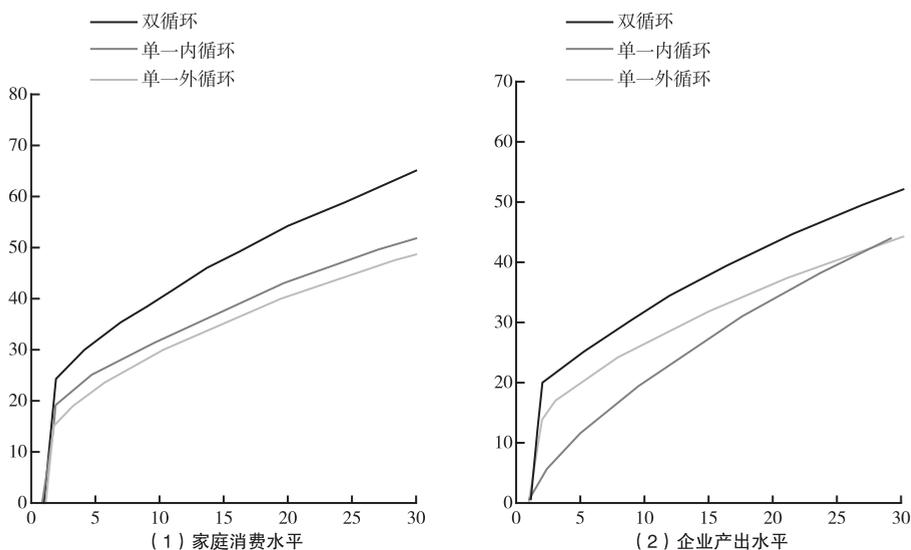


图1 三种循环体系下家庭消费和企业产出的运行特征

注：纵轴为偏离稳态的百分比，横轴为以年度为单位的模拟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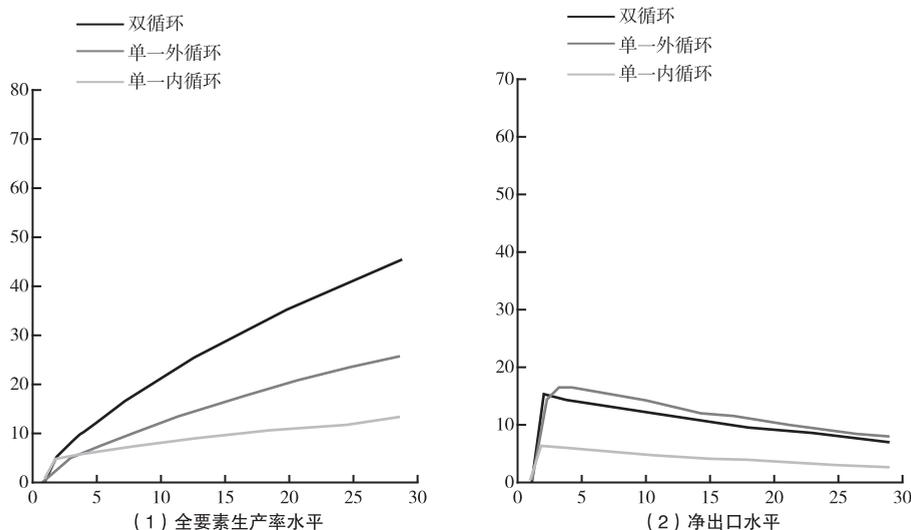


图2 三种循环体系下全要素生产率和净出口的运行特征

注：纵轴为偏离稳态的百分比，横轴为以年度为单位的模拟时期。

生产率水平,但净出口水平略低于单一外循环模式下的水平。其机制主要在于,一方面,在双循环体系下,国际、国内的前沿技术交流较多,能够产生更多的“创造性破坏”,带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在双循环体系下,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互补式增长,带动进出口水平仅略低于单一外循环模式主导下的水平,同时明显高于单一内循环模式主导下的水平。

三 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前文通过构建存量一致性模型,采用经济理论分析方式,对“双循环”理论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明确提出:只有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经济体系,才能够提高家庭消费、企业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在从理论层面对构建双循环经济体系的关键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为探究战后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实际情况,接下来将使用 VAR 模型这一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入手,探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差异,从而验证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外循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是否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模型选择日本 1960~2021 年度的经济数据,考察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本文选取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日本经济增长,并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 *JGDP* 表示。由于居民消费增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流通体系畅通是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作为表示居民消费增加的代理变量,以 *COM* 表示;使用制造业附加值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以 *MANU* 表示;采用零售业年度销售额作为流通体系畅通的代理变量,以 *SALE* 表示。此外,为反映日本经济的外循环,将日本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净出口额作为代理变量,以 *JEX* 表示。

本文选择的数据时间段为1960~2021年度,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制造业附加值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经济统计”^①,零售业年度销售额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商业统计”^②,净出口额数据来自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③。

(二) 模型的构建

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具有能够估计全部内生变量之间动态联系的优点,被广泛用于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国内生产总值、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制造业附加值、零售业年度销售额、净出口额等5个变量的VAR模型。这5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如式10所示:

$$y_t = A + B_1 y_{t-1} + \dots + B_p y_{t-p} + U_t \quad (10)$$

其中,

$$y_t \begin{pmatrix} JGDP_t \\ COM_t \\ MANU_t \\ SALE_t \\ JEX_t \end{pmatrix}, A = \begin{pmatrix} A_1 \\ A_2 \\ A_3 \\ A_4 \\ A_5 \end{pmatrix}, B_i = \begin{pmatrix} B_{11,i} & B_{12,i} & B_{13,i} & B_{14,i} & B_{15,i} \\ B_{21,i} & B_{22,i} & B_{23,i} & B_{24,i} & B_{25,i} \\ B_{31,i} & B_{32,i} & B_{33,i} & B_{34,i} & B_{35,i} \\ B_{41,i} & B_{42,i} & B_{43,i} & B_{44,i} & B_{45,i} \\ B_{51,i} & B_{52,i} & B_{53,i} & B_{54,i} & B_{55,i} \end{pmatrix}, U_t = \begin{pmatrix} U_{1t} \\ U_{2t} \\ U_{3t} \\ U_{4t} \\ U_{5t} \end{pmatrix}; U_t \sim i.i.d(0, \Sigma)$$

在模型的具体分析上,本文采取分段分析的研究方法,即先估计泡沫经济崩溃前的1960~1990年度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变化情况,再估计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1~2021年度的情况。通过分段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日本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差异,明晰日本经济双循环的实施情况。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运用单位根检验方法,确认各经济变量的平稳性。由单位根检

① 「国民経済計算(GDP統計)」、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② 「商業統計」、経済産業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yogyo/index.html>。

③ 財務省貿易統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

验可知, 各经济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 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变得平稳, 即各经济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次, 综合使用 LR、FPE、AIC 准则, 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2, 即 $p=2$ 。再次, 采用约翰逊协整检验的方法, 对变量 *JGDP*、*COM*、*MANU*、*SALE*、*JEX* 进行协整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根据协整检验结果, 这 5 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 5 个协整关系, 即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此外, 由于 VAR 模型所有根的倒数均小于 1, 即均在单位圆内, 所以本文建立的 VAR 模型是稳定的。

表 4 约翰逊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水平值	协整的原假设	检验结果
0.791	101.568	69.819	$r = 0$	None *
0.531	56.194	47.856	$r \leq 1$	Atmost1 *
0.451	34.247	29.797	$r \leq 2$	Atmost2 *
0.350	16.834	15.495	$r \leq 3$	Atmost3 *
0.138	4.323	3.841	$r \leq 4$	Atmost4 *

注: * 表示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已建立的 VAR 模型基础上开展脉冲响应分析, 可以明确泡沫经济崩溃前后 *COM*、*MANU*、*SALE*、*JEX* 等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对 *JGDP* 所造成的影响。1960~1990 年度的脉冲响应如图 3 所示。

如图 3 所示, 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 给定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不断上升, 并在第 3 期达到最大值, 后期正向影响趋于平缓。这表明日本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给定制造业附加值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并在第 5 期之后逐渐趋于稳定。这说明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 日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对日本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给定净出口额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上升, 并在第 4 期之后趋于平稳。这表明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 日本经济的外循环对国内循环的支撑与推动作用显著的, 外循环的发展推动了内循环的进步。但是, 给定零售业年度销售额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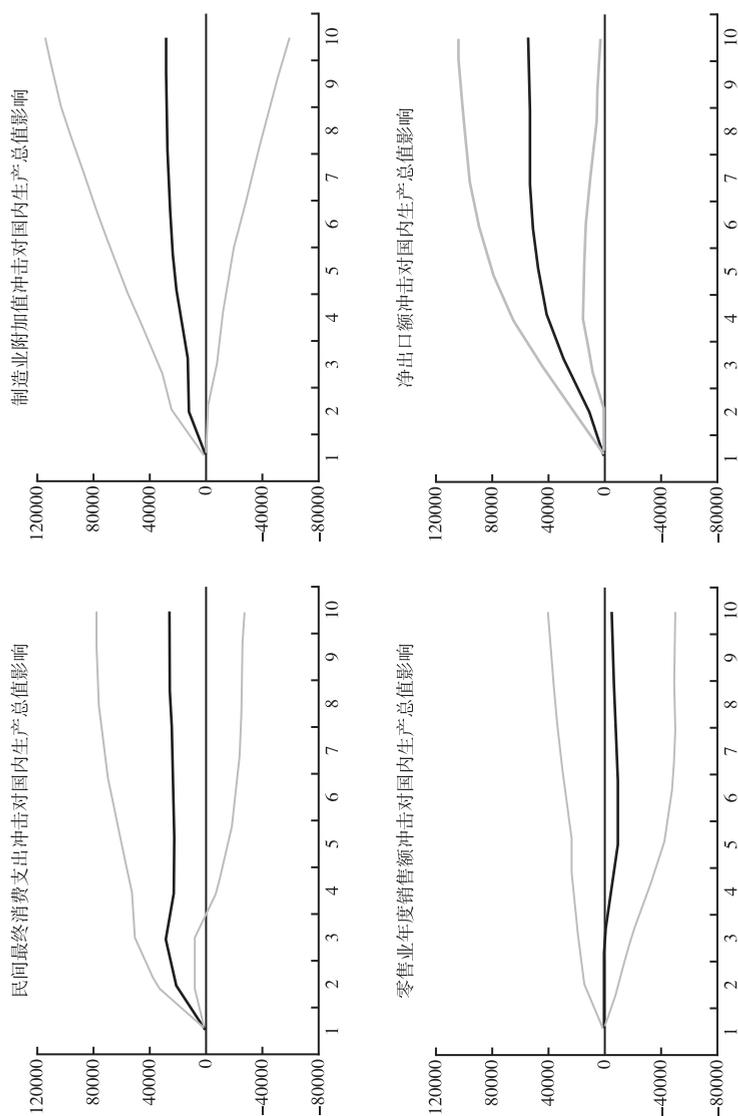


图 3 泡沫经济崩溃前 (1960~1990 年度) 日本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

注：纵轴为以百分比表示的单位冲击引起的波动，横轴为以年度为单位的冲击滞后回数；深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浅色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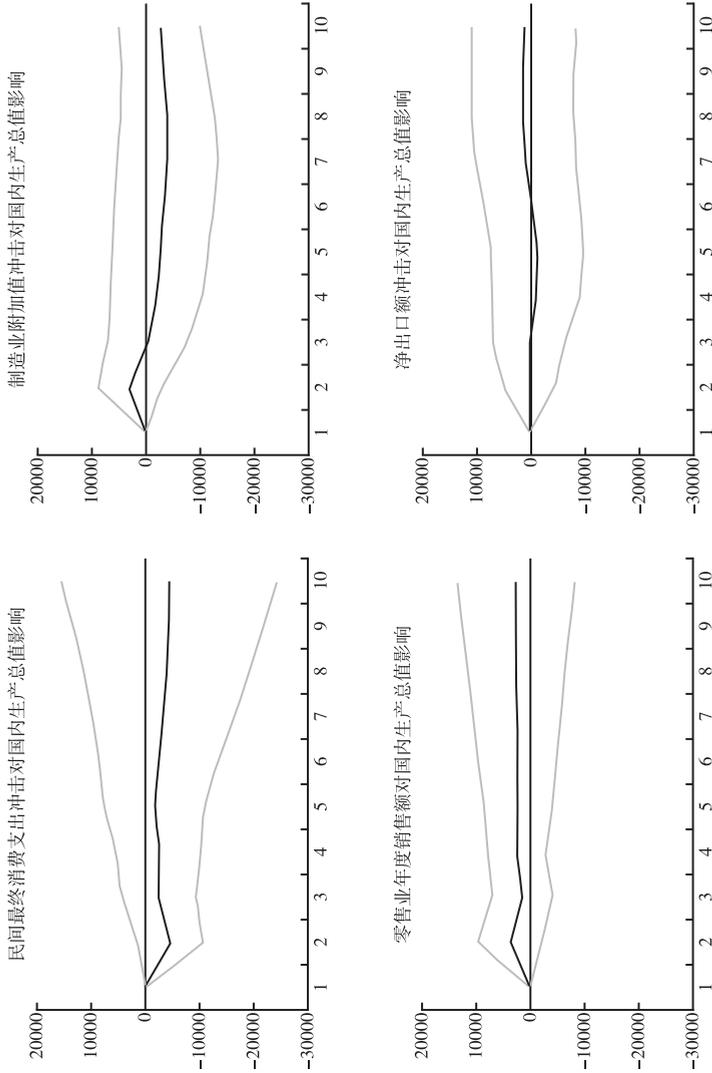


图4 泡沫经济崩溃后(1990~2021年度)日本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

注:纵轴为以百分比表示的单位冲击引起的波动,横轴为以年度为单位的冲击滞后期间数;深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浅色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并且在第4期之后趋于下降。这表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国内物流体系并不畅通，“大型零售店法”等零售部门规制限制了其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对日本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效应。

如图4所示，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给定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升反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值，而后趋于平稳。这说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体现为负效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失。给定制造业附加值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虽然它第2期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在第3期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下降并趋于稳定。这说明，泡沫经济崩溃后，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步伐放缓，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循环受阻。给定净出口额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冲击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这说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外循环对内循环的拉动效应不再明显，日本经济的双循环受阻。但是，给定零售业年度销售额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并在第4期之后趋于稳定。这说明，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日本针对流通产业开展的一系列规制改革产生了积极效果，提高了国内循环效率，为日本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 日本经济双循环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其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的运行关系也对经济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需进一步分析日本经济双循环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扩大国内消费对于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运行具有重要作用。V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正向转为负向。

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收入增长支撑了日本的消费增长，进而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60年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减少低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日本的居民收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快速增长，全产业劳动者月平均现金工资额从1960年的2.4万日元迅

速增长到1973年的12.3万日元,增加了4.1倍。^①日本居民收入不断上涨,有力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带动了日本经济的良性循环。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施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运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开始实施规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干预。桥本龙太郎内阁推行“六大改革”,全面实施行政、经济、金融等领域改革措施;小泉纯一郎内阁着力推行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结构改革,试图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供给层面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行政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邮政民营化改革、地方财政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其中,劳动力市场改革调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企业雇佣方式,通过修改“劳务派遣法”,取消了对派遣时间的限制,允许制造业现场工作中使用劳务派遣工,实现了“介绍预定派遣”的合法化。^②受此影响,日本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人数持续增加,从2004年的1564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2075万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占日本劳动者的比重也相应从31.4%上升到36.7%。^③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数量的持续增加不仅导致日本劳动者收入增长幅度长期低迷,也使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日趋突出。2021年,日本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为21.6万日元,仅为正式员工平均月收入(32.3万日元)的67%。^④在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更倾向于雇用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以降低企业劳动支出成本。这导致日本劳动者的工资增速长期停滞不前,日本劳动者名义报酬年增长率从1995年的2.3%下降至2020年的-0.2%。^⑤此外,日

① 「毎月勤労統計調査」、厚生労働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hlw.go.jp/toukei/list/30-1a.html>。

② 星岳雄・ア Nil・K. カシヤップ『何が日本の経済成長を止めたの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3、86頁。

③ 「非正規雇用の現状と課題」、厚生労働省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12月1日、<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830221.pdf>。

④ 「令和3年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厚生労働省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12月1日、<https://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chingin/kouzou/z2021/index.html>。

⑤ 『令和3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レジリエントな日本経済へ一強さと柔軟性を持つ経済社会に向けた変革の加速一』、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9月1日、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1/index_pdf.html。

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愈加凸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结果显示，2018年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33，高于澳大利亚的0.32、德国的0.3、法国的0.29。^①受收入增速下滑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日本居民消费增速也从1995年的2.4%下降到2020年的-5.9%。^②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实施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导致其国内劳动者收入长期低迷，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其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构建。

第二，产业的有序升级转换是推动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行的关键。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这一效应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消失。

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政府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产业政策，不断淘汰落后产业，积极促进产业升级转换，促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发展，助推了其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施的产业政策开始转向保护落后产业，没有积极促进产业升级转换，阻碍了其国内大循环体系构建。泡沫经济崩溃导致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急剧恶化，大量企业倒闭，僵尸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日本的产业政策不再将特定的产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而是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推动企业经营业务调整重组、企业经营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等问题上。1995年后，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从政策措施层面推动企业进行经营业务的“选择与集中”，促进企业将经营业务资源集中到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领域，并将剥离出来的业务部门合并重组，以盘活企业的经营业务资源。^③但是，这一系列产业政策对于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转换的效果不甚

① “Income Inequality”, OECD, December 1, 2022, <https://data.oecd.org/inequality/income-inequality.htm>.

② 『令和3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レジリエントな日本経済へ—強さと柔軟性を持つ経済社会に向けた変革の加速—』、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9月1日、https://www5.cao.go.jp/j/wp/wp-je21/index_pdf.html。

③ 田正、江飞涛：《日本产业活性化政策分析——日本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期。

明显。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NEC、日立、三菱电机三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业务部门合并,设立了尔必达公司。为提高日本DRAM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还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为该公司注资300亿日元,但其主力产品“优先动态随机存储器”(Premier DRAM)并未出现预想的销售增长。最终,尔必达公司在2012年破产,负债总额达4480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制造业领域最大规模的破产事件。^①2012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日立、东芝、索尼三家公司的液晶面板生产部门合并,设立了日本显示器公司(JDI)。为促进JDI的尖端液晶面板研发,日本官民合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日本产业投资机构”在2012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先后向其投资2000亿日元、750亿日元、1070亿日元、200亿日元,但这些资助并未使该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显著增长。由于在有机液晶面板方面的研发落后,JDI的智能手机液晶面板销售下滑,截至2021年3月已经连续7年陷入经营亏损。^②由此可见,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起到推动产业有序升级转换的作用,也没有达成维持日本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等领域技术优势的目标,不利于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形成。野口悠纪雄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致力于援助丧失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并未发挥提高基础研究开发能力的作用。^③

第三,建设高效的流通体系,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前流通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泡沫经济崩溃后,流通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零售行业就开始推动流通体系改革,引入超级市场销售模式、建设大规模专业零售店等,试图构建以零售商为主导的新型流通体系。但“大型零售店法”等零售部门规制阻碍了日本流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流通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① 《从尔必达破产看产业政策的“缺失”》,nippon.com,2012年6月22日,<https://www.nippon.com/cn/currents/d00032/>。

② 《日本显示器JDI就这样迷失7年》,日经中文网,2019年4月4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35031-2019-04-04-10-59-45.html?start=1>。

③ 野口悠纪雄『円安と補助金で自壊する日本』、ビジネス社、2022、158頁。

并不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实施了针对流通业的改革，提高了国内循环效率。

战后，随着日本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形成，日本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积极构建自有流通体系，将零售店置于自己的生产销售系列之下，形成了生产企业主导的流通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社会对日本流通业存在排外性与不透明性的批判声音日趋加大，日本开始加大流通业改革的力度。《90年代流通业展望》指出，要推动流通业结构性改革，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构建高效率流通体系。^① 1994年日本放松“大型零售店法”对零售店店铺面积的限制，提出“大型零售店立地法”，并最终在2000年废除“大型零售店法”。^② 尤其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日本认为需要增强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在流通业中的作用，促进流通业企业掌握顾客数据，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提高流通效率。^③ 受此影响，日本流通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效率持续提高。在零售业方面，日本零售业企业数量从1991年的159.1万家减少到2016年的99万家，但零售业销售额从140.6万亿日元增加到145.1万亿日元，反映出日本零售业效率的提高。在批发业方面，日本批发业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37.9万家减少到2016年的36.4万家，但批发业销售额从413.3万亿日元增加到436.5万亿日元，表明日本的批发业整体效率提高。^④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流通产业开展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日本流通业的透明度，强化了信息技术在流通业中的应用，提高了流通业的运行效率，从而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建设。

第四，只有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体系，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

① 石原武政「通商産業政策史 第4巻」、経済産業調査会、2012、215頁。

② 徐梅：《日本的规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第262頁。

③ 総務省「情報通信白書2018年版」、総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18年12月1日、<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9/pdf/n3100000.pdf>。

④ 「商業統計」、経済産業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yougyo/index.html>。

前外循环对日本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再显著。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府采用外汇配额和进口限额等管控措施,积极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实现进口替代,借助海外资源发展国内产业。至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进一步完善全球产业链布局,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海外,着力发展汽车、电子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以外促内的良性循环。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产业过度迁出,导致了产业空心化,不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积极加入WTO,进入21世纪后则积极实施对外经贸战略,近年来更是签署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EPA、日英EPA、日美贸易协定等。在亚太地区,日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中国、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关税减让安排,还在2022年参与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推动日本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发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也持续增加。1995~202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26.5亿美元增长至2107.6亿美元,其中对中国、东盟、美国、欧盟的直接投资分别从31.8亿、39.8亿、111.1亿、32.1亿美元增加到120.8亿、364.3亿、817.6亿、199.1亿美元。^①受此影响,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从1996年的1.8万亿日元增长到2021年的14万亿日元。^②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比例也从2001年的24.6%上升到2021年的33.8%。^③虽然日本通过推动企业开展全球化经营获得了可观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但这也引发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随着日本企业在海外生产活动的展开,其海外子公司的产品生产活动愈加活跃,日本进口的海外商品持续增加,抑制了对日本国内生产产品的需求,不利于日本国内厂商生产活动的开展,进而阻碍了其进一步开展研发

① 「直接投資統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12月1日、<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

② 「対外・対内直接投資(地域別・業種別)」、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fdii.htm。

③ 『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国際協力銀行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12月24日、<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21/1224-015678.html>。

创新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日本的商品进口额从1996年的37.9万亿日元增长到2021年的84.8万亿日元^①，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从1991年的20.1%下降到2020年的16%^②，资本生产率^③也从1996年的8.17%下降到2021年的7.2%。简言之，日本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其国内设备投资增长受到抑制，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驱动作用无法实现，不利于日本的经济增长。

结 语

纵观战后日本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关系的变化，只有当其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长期低迷，经济总量增长缓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23年日本的GDP将比上一年减少0.2%，下降至4.2万亿美元，低于德国，这将使日本在世界GDP中的排名从第3位下降至第4位。^④日本只有重新调整其经济结构，扩大经济内需，切实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促进对外经济合作，才能够促进其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一，扭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断提高日本国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而提高日本国内消费水平，促进日本经济发展。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实施了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结构改革，这虽然对提高日本经济资源使用效率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引发了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工资增速长期停滞不前、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低迷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其国内

① 「貿易統計 年別輸出入総額」、財務省貿易統計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nenbet.htm>。

② 『令和3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レジリエントな日本経済へ一強さと柔軟性を持つ経済社会に向けた変革の加速』、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21年9月1日、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1/index_pdf.html。

③ “资本生产率”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

④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 October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大循环的构建。岸田政府推出“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对此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整，强调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无法有效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特别强调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试图通过实施劳动方式改革，推动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增加员工工资，进而提高日本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日本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再教育，支持员工接受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完善个人所得税中职业再教育项扣除细则；推动日本企业开展绩效工资改革，构建透明且高效的工资制度，完善人才筛选与培育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移动，鼓励员工兼职创业，构建高效的人力资源信息平台等。^①

第二，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为日本国内经济循环提供有效支撑。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致力于支持丧失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没有起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作用。为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日本重新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重视政府在产业升级转型中的作用，在“企业家型政府理论”的指导下，将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应对气候变化等纳入了日本产业政策的范畴。^②特别是，日本提出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目前，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试图通过发展绿色产业，促使日本获得新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2023年2月，日本推出“绿色转型推进法”，设立绿色转型推进机构，制定“绿色转型推进计划”，预计在10年内发行总额达10万亿日元的绿色经济转型债券，引入增长导向的碳定价制度，以促进日本经济绿色转型，加快绿色产业发展。^③

① 「新しい資本主義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及び実行計画 2023 改訂版」、内閣官房ホームページ、2023年6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eisaku/atarashii_sihonsyugi/index.html。

② 田正、杨功金：《大变局下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动向》，《日本学刊》2022年第6期。

③ 「『脱炭素成長型経済構造への円滑な移行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案』が閣議決定されました」、経済産業省ホームページ、2023年2月10日、<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2/20230210004/20230210004.html> [2023-10-25]。

第三,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外循环对日本内循环发挥支撑作用,推动其经济增长。但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外循环对日本内循环的支撑作用消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当前,日本政府不顾日本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持续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政策,阻碍了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不利于日本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了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2022年5月,日本政府推动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具体包括:维持重要物资的稳定供给,确保基础设施体系的安全运转,推动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实施专利非公开制度等。^①日本推动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阻碍了国家间正常的商品与服务贸易往来,妨碍了日本企业全球供应体系的建设,减少了日本产品的销售市场,不利于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探讨,无益于日本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创新。日本只有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来,加强全球经济、贸易与科技合作,才能有效推动其对外经济合作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正循环,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审校:叶琳)

^① 「経済施策を一体的に講ず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の確保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内閣府ホームページ、2022年5月1日、https://www.cao.go.jp/keizai_anzen_ho_sho/。

with the dilemma brought by Perry Expedition,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Zhu Xi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to Mitogaku gave birth to the thought of “Revere the Emperor and Expel the Barbarian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Song Dynasty Confucianism, which provided the opposition faction with a powerful banner for reform. Meanwhile, the tradition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allowed all social strata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even the national trend of modern Japan after the political reform.

Keywords: Edo Period; Shogunate System; Revere the Emperor and Expel the Barbarians; Parliamentary Regime Theory; Meiji Restoration

• **Economic Research** •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ual Cycle” of Japanese Economy

Tian Zheng and Li Xin / 191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has always taken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driving power,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mestic cyc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ycle having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ts economic growth.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riple connotations of the dual-cycle economic system, and based on macroeconomic theory, a stock-flow consistency model of an open economy is constructed, pointing out that household consumption, enterprise output level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evels are even higher under the dual-cycle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 model, we analyzed the dual cycle system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dual cycle system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shows obvious differences. The hollowing out of industries, the failur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difference, while the reform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Japan can only boost its economic growth by forming a system in which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reinforce each other.

Keywords: Japan; Stock–flow Consistent Mod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Circulation Industry